

走向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观

王治河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的“一章”，伴随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强势，现代发展观风靡一时，受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然而，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相反却导致了贫富的鸿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共同体的毁灭以及虚无主义的弥漫。面对日益增长贫困，不平等和环境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和非道德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发展观。要破除人们对发展的崇拜，对经济增长的迷恋，超越现代榨取型经济，实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就有必要反思以个人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为特征的第一次启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而建立在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国与他国的“共同的福祉”为旨归的第二次启蒙，从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呼唤一种后现代发展观。所谓后现代发展观是一种厚道发展观，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宗旨，以人的幸福为鸿图的。这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人性化的和谐发展观，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现代发展观的各种弊端，而且有助于我们找回生命中久违的意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 厚道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发展观 第二次启蒙 生态文明

王治河，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50001

一、现代西式发展观的失败

随着西式现代性即现代西方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在世界范围的风靡，现代发展观或曰“现代西式发展观”一直受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现代发展观将发展“窄化成经济的增长”^[1]，视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鸿的，以至于“经济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2]现代发展观的拥趸深信，经济的增长将解决世界上一切最重要问题。他们迷信“经济增长”，坚信：(1)经济增

[1]W.M. Adams, *Green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2, p.10.

[2]戴利(Daly, H.E)、弗蕾(Farley, J.):《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徐中民等译，〔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长将改善人民的经济福利;(2)经济增长能够克服贫困;(3)经济增长创造工作机会;(4)经济增长得到高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5)经济增长改善健康和教育状况;(6)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过度增长问题;(7)经济增长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在穷国,最紧迫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环境问题可以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满足基本的需求;(8)经济增长也可以导致民主政府。自由市场导致自由选举和公民权利的提升^[1]。盖而言之,现代发展观让人们相信,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随着GDP的增长,以往困扰人类的重大疑难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自由和平等一定能够得到实现。

然而,随着其负面效果的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意识到发展不是万能的,意识到“发展的局限与失败”^[2]。在过去的20年里,整个拉丁美洲弥漫着对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政策的“失望”^[3]。“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模式的破产,到处可见的生存条件的恶化,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冲突的尖锐化,以及存在基础的毁灭,无不极大地“粉碎了”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现代西式发展概念的“幻觉”^[4]。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首先,现代发展模式的发展往往是以剥削第三世界的穷人为代价的,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世界名牌都是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通过剥削妇女和童工生产的。

其次,现代发展模式对传统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由于广大第三世界的农村经济不属于货币体系,该经济体系下人们的经济状况也就不属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范畴了。但当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里找工作时,他们的家庭、社区和文化便开始瓦解,而且每个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情况变得更糟,国民生产总值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他们现在挣工资,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再次,对于现代社会中“虚无主义”的弥漫和“道德严重滑坡”的大面积发生,现代发展观也是难辞其咎的^[5]。因为现代发展观对经济的过分崇拜,势必导致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思潮的风行,而见利忘义、制假造假、贪污受贿、坑蒙拐骗、制黄贩黄、走私贩私、卖淫嫖娼、见死不救、人情冷漠等严重道德滑坡的发生就成为了一种逻辑的必然。当金钱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的时候,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往食品里添加致癌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现代发展模式所取得的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大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式发展观所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在根蒂上是一种“榨取型的发展”,一种竭泽而鱼式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发展模式使得“地球表面的生命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人类行动的严重威胁”^[6]。因为正是现代发展模式运用科学技术把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将大量有毒的污染物质扩散到空气,水和土壤中,对地球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话,等待人类的将是全球生态崩溃的前景,这业已成为科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必须“重新审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的前提,修正这些前提,进而从修正的前提中推演出新的理论”^[7]。极端者如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甚至呼唤开展一场“生态革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8]。

[1][5][6]John B., Jr. Cobb,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t*. MacMillan Press, 1999, pp.28-30, pp.32-35, p.37.

[2][4][9]W.M. Adams, *Green development*, p.376, p.175, p.377.

[3]Joseph E. Stiglitz,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in Kevin P. Gallagher. ed. *Putting Development First*, Zed Books, 2005, p.15

[7]M. Shamsul Haque, *Restructuring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olicie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6.

[8]John Foster,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423

二、后现代对现代发展理论的解构

随着现代发展模式上述弊端的日益暴露,不仅舆论层面上“发展已经过时”,“发展未必是好的”^[1]“发展的确制造了受害者”^[2]“发展具有毁灭性的一面”^[3]等另类声音开始在西方出现,而且从理论层面对现代发展概念的反思也在深入进行,这方面,后现代思想家居功厥伟。运用解构主义作方法论,他们对现代发展概念进行了解构和批判。不仅质疑了发展的本体论基础,而且揭示了发展概念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色彩,以及西式发展概念给发展对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发展的信仰,颠覆了人们对发展的迷信。他们的研究表明,西方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自我辩解的建构”,一种“自我欺骗”^[4],而且作为第一次启蒙的产儿,现代发展观可以在西方启蒙哲学中找到它的根^[5]。换句话说,正是17,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第一次启蒙为现代发展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中启蒙哲学的个人主义,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欧洲中心主义及其线性发展观直接构成了现代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1. 第一次启蒙中的个人主义

现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将人在根蒂上看做是个人主义的,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独立存在的,彼此间或与社会其他成员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人也被认为是“理性的行动者”,换句话说,人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做选择的。这种个人主义鼓励享乐主义和追求肉体享乐。经济的惟一目的就是开发自然世界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商品生产供人类使用。“这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关键的价值选择:惟一公认的好的标准就是个人的选择。”^[6]这种个人主义在现代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教授,是“人都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概念的始作俑者。从牛顿力学出发,斯密认为人本质上是经济动物,是“经济人”,满足人的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因此之故,使这位道德哲学家对当时英格兰工厂工人“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持一种几乎完全“漠视”的态度^[6]。

2. 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这样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姿态。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她只有“服从”的权利^[7]。从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立场出发,“土地”变成了完全是为了“定居和占有的;土壤是为了耕种,森林是为了木材,河流是为了旅行,为了田园灌溉,为了发电,狼,熊和蛇等这样的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被猎杀;海狸,鹿,兔子,鸽子这样的动物则是为了提供毛皮或者食物”^[8]。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不敬,对自然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启蒙

[1][4]W.M. Adams, *Green development*, p.378, p.9.

[2]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6

[3]Yvonne Burgess, *The Myth of Progress*. Wild Goose Publications, 2004, p.131

[5][美]凯罗·詹森:《从怀疑海的过程审视全球经济》,载《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6]Charlene Spretnak,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58.

[7]Water F. Baber & Robert V. Bartlett, *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emocrac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5, 206.

[8][美]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曹静译,张妮妮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4页。

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1]。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2]。

3. 欧洲中心主义

按一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分析,所谓现代“发展”概念,远非“价值中立的”,它“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种族主义中”^[3]具有极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4]。作为“西方化的发展”,发展概念实质上反映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它事实上“预设了对物质主义,科学等“西方价值观的委身”,所谓发展,“在本质上意味着投射欧洲社会模式到整个世界”^[5]。因此,“它是欧美中心的,是由西方人为了西方的利益而打造的。”^[6]此外,由于现代发展概念用纯粹西方的经济尺度,用GDP衡量一切,价值一切,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富国”对穷国的歧视。然而事实上,按照有西方学者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所谓第三世界的“穷国”尽管经济不发达,但它们在文化心理上和精神上是富有的。它们的人民享受着现代工业社会所匮乏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平和远比高度的GDP更有价值。第一和第二世界经济上虽然富裕,但高度的异化,高离婚率和高自杀率的发生使它们沦为实际的“穷国”。如果个人的幸福是衡量穷富的标准的话,“那许多第三世界应该位列第一世界”^[7]。

4. 决定论和“线性进步理论”

现代西式发展概念具有很强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这源于它接受了第一次启蒙的“线性进步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向高,直至理想世界的不断进步的直线运动。启蒙运动的旗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提供了线性发展观的经典范例。他将人类发展史与人的成长史作了类比:东方的历史是人类的童年,属于“非历史性的历史”;希腊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的青年;罗马国家是人类的成年;日耳曼国家是人类的老年。这种线性发展观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例如,具有5000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就被排除在这一发展之外。启蒙运动的这种线性进步观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发展观。按照这一理论,所谓发展就是要经历西式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现代西方”据说就是被这一发展过程“重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被看作是一个“铁定的线性变化之路”^[8]。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经过这一过程。这被看做是历史的进步,是理性的必然的进程。反对这一过程,或者不介入这一进程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落后,就是反动。

5. 非道德主义

按照后现代哲学家的剖析,“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背后是非道德主义对它的支撑。由于现代发展观对经济利益的过分尊崇,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逐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自然导致了道义的缺席,决定了人们为达增长的目的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道德和正义问题自然不在考虑之列^[9]。这种非道德主义支持了恶性竞争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展开,恶性竞争反过来又助长了非道德主义的广泛蔓延,演变成现代社会难于根治的顽疾。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艾特宗尼的阐释,从ITT公司的CEO千方百计推翻智利政府以保护他们的产品,到黑手党强行推销海洛因,从大公司用贿赂的手段登上排

[1]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54.

[2]Stephen Crook,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1992, p.210.

[3]Yvonne Burgess, *The Myth of Progress*. Wild Goose Publications, 2004, p.131.

[4]Ozay Mehmet, *Westernizing the Third World: The Eurocentric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Routledge; 2 edition., 1999, p.148.

[5]Gerald Braun “The poverty of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s.” *Economics* 42 (1990): pp.55-66.

[6]Ozay Mehmet, *Westernizing the Third World*. p.152.

[7]Jim Norwine and Alfonso Gonzalez eds. *The Third World: States of Mind and Being* Unwin Hyman, 1988, p.16.

[8]W.M. Adams - *Green Development*, p.8.

[9]Brenda Bredemeier and David Shield, “Values and violence.” *Psychology Today* (1985, October), p.25.

行榜,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无一不是这一“美国顽疾”的“表征”。对此,他和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一样,深感忧虑^[1]。

其实,刚刚踏上发展之路的中国,业已亲身感受到这一非道德主义毒瘤所给社会带来的戕害。幸运地是,在今日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股脑将中国传统的“责在人先,利在人后”之古训扔进岁月的垃圾沟,一心拥抱现代西方榨取型发展观,无疑是个历史的错误。因为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存在着价值的“应该”。一个只论发展不问是非对错的社会,或许与“富强”很近,但却离“文明”很远^[2]。在根底上这也是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背离的。

三、建设性后现代的厚道发展观

不难看出,在解构现代发展观的霸权,戳穿现代西式发展的神话方面,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性后现代思想家居功厥伟。他们对整个现代机械世界观,价值观和榨取式发展模式的拒绝,对仍沉睡在发展美梦中的“发展控”无疑是一记猛喝。然而,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发展观的批判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局限。局限之一是它激进的否定主义立场。这种激进的否定主义立场不仅使它一心盯在现代发展观的弊端上,完全忽视了现代发展观积极的一面,而且使它在否弃现代西式发展观的同时连发展本身也一起否定掉了。其情景不啻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同倒掉。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对现代发展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既不客观公正也远非一种历史的态度。因为平心而论,在提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方面,现代发展观的确有其值得炫耀之处。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柯布博士将这些殊胜处概括为以下三点:(1)减少了西方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2)减少了阶级之间的冲突;(3)解构了夜郎主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全球视野思考问题^[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发展成就也雄辩地证明,完全否定发展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着这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提升到世界第一位,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也正是因着这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5]

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因着现代西式发展模式出现问题而彻底放弃发展,不啻因噎废食。用我国有学者的话来说,这种反对发展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显然也是“不公平、不现实的”^[6]。建设性后现代发展观主张适度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他们看来,在许多贫穷地区,“经济发展仍有必要”,适度地发展不仅有助于消除贫困,减少为生存而造成的生态破坏,而且贫困人口生存状况的改

[1] Amitai Etzioni, “After Watergate – What?: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Human Behavior* Vol. 2, No. 11 (November, 1973), p.7.

[2] 刘擎:《达尔文主义的迷思》,〔广州〕《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期。

[3] John B., Jr. Cobb,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t*. MacMillan Press, 1999, pp.32-33.

[4]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发生根本性历史转变》, http://www.ce.cn/cyssc/newmain/jdpd/hglc/200811/18/t20081118_17413650.shtml。

[5] 习近平:《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贺信》,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5584250.html>, 2011年9月5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6] 鲍宗豪:《文明城市与可持续发展——在华东理工大学的讲演》,〔上海〕《文汇报》2011年7月4日。

善,有助于人口增长模式转型,从而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1]。

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发展观上的另一重大局限是建设性的匮乏。由于痴迷于解构,奉解构为主臬,任何一种学说的提出,任何一种理论的建构都被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讥讽为“意识形态”。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它不愿也无力提出任何新的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它的不愿是因为它拒斥一切“宏大叙事”,它的无力则源于它的“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2],这种与历史进行彻底决裂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它无法吸收传统的养料,逐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性和原创性的枯竭就成为必然。

而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与躲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袖手言解构相较,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则是一条远为艰难的路。可贵的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3]。

通过对现代西式发展观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吸纳,从第二次启蒙的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提出了一套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新的后现代发展观。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否认存在任何解决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4]。否认存在着“适应所有地方,所有情况”的发展模式^[5]。然而,义不避责,冒着“重建宏大叙事”的风险和指责,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秉承为天地苍生操心的原则,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发展的另类思路:一种后现代的发展观。所谓后现代发展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宗旨,以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厚道发展观。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后现代发展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的

“后现代发展观拒绝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深度生态的,它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更大的有限系统的组成部分。”^[6]它强调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枝体相连,息息相关。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认为,内在价值并不只限于人类,构成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也不只限于人和人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以及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与现代发展观把人跟自然的关系看做占有式的关系不同,后现代发展观强调,人是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宾客。人类的一切都与自然相关,人与自然的这种血脉相连性决定了人的幸福取决于自然的幸福,因此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应该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落实到经济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发展一种“建基于可再生能源和各种后现代农业的稳态经济”^[7]。“用可持续方式生产绝大多数必需品。”^[8]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大方针是一致的。

2. 后现代发展观是以人的幸福为目的

与现代发展观漠视共同体和人的关系,将日益增长生产和消费视为惟一的目标相反,后现代发展观寻求的社会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9]。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强调:经济增长

[1][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2]有关“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的态度”的分析,请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部分。

[3]《后现代精神与后现代思想家的风骨——从敢于向霸权说“不”的格里芬谈起》,〔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W.M. Adams, *Green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2, p.376.

[5][6]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p.222, p.222.

[7]大卫·格里芬:《探索走出“一切照旧”困境的路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2日。

[8][美]小约翰·柯布:《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前景更为乐观》,柯进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2日。

[9]John B. Cobb, *Sustainability—Economics, Ecology and Justic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2, p.50.

不是目的地,只是通往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发展的代名词^[1]。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是人的幸福。据此他们主张“边缘化经济”^[2],也就是把经济从中心神坛上请下来,强调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惠及每一个人,必须有助于消除贫困,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和幸福指数。据此他们批评现代发展观对自然环境的意义的忽视,对生活质量的忽视,以及对经济“增长”之社会的、心理的和生态的后果的忽视。

后现代思想家进一步解构了“财富增长等于幸福”的等式。尽管有证据显示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不断上升,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人自我评价的幸福感却呈报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更多的财富并不能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著名后现代幸福经济学家马克·安尼爾斯基提出了一个“真实财富”的概念。“真实财富”概念将美德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幸福和进步的标志必须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以及对居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东西相一致。但是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进步是通过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以及他们对于真实幸福的体验而显现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高度评价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概念(即GDH概念),认为它能够“测度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东西”^[3]。

3. 后现代发展观推重地方共同体经济

如果说现代发展观青睐“个体经济”的话,那后现代发展观则推重“共同体经济”。与现代发展模式为资本服务,为发展服务不同,后现代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应该为共同体服务,而且共同体的价值决定了那些被视为发展的东西”^[4]。相应地,与现代发展模式把焦点放在发展城市的工业,通过提供成本非常低廉的劳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同,后现代的共同体经济则将重点放在繁荣发展地方共同体上。因为“地方共同体只有控制了其自身的经济,才能成为人类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中的一个健康和有效的共同体”^[5]。后现代发展观的一般原则是,权力应该被局限于能够着眼当前问题而采取行动的最小共同体之中。地方控制更优于远程控制,因为它更能赋权于人民。

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推重地方共同体经济的后现代发展观为企业的民主管理,为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可能有助于一种更为健康的经济。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做大,它们“已然控制了80-90%在茶,咖啡,可可,棉花,森林木材,烟草,黄麻,铜,铁矿石和铝土矿贸易。但他们还想要更多”^[6]。鉴于全球权力日益从政治控制转向经济控制,后现代发展观对发展地方共同体的强调特别是对地区经济自给的强调,无疑符合各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为相较全球而言,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一个地方共同体。

4. 后现代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如果说现代“榨取型发展模式”或“终结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话,那么后现代发展观则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要顾及将来世代人的权益。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1990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操作性原则,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那么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它们是:(1)所有可再生性资源的开采用水平应当小于等于种群生长率,即利用水平不应超过再生能力;(2)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应当低于自然界的净化能力;(3)将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利用获得的收益区分为收入部分和资本保留部分,作为资本保留的部分用来投资于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以便不可再生性资源耗尽时有足够的资源替代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持久生存。

[1]Uma S. Kambhampati, *Developing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Polity Press, 2004, p.19.

[2]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p.216.

[3]Mark Anielski, “Building Economies of Wellbeing.” Paper for Fif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laremont, April 28-29, 2011.

[4][5]John B. Cobb, *Sustaining the Common Good*, Ohio: The Pilgrim Press, 1994, p.57, p.48.

[6]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04.

如果说达利侧重从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角度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话,那柯布则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发可持续发展的。在他看来,“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仍然很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只要穷人也抱有他们将分有新的财富这一现实希望,他们就会忍受其贫困并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会接受一代又一代人之持续贫困吗?随着分有新的财富这一承诺失去了信誉,这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变得愈发可疑了。”^[1]柯布坚持认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应该以谋求个体与群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应该是个人与共同体的互茂共荣。福斯特也强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应该使社会中最贫穷的部分受益”^[2]。不难看出,与现代发展观的非道德主义不同,后现代发展观有一种内在的道德关怀,一种本真的“利他性”^[3]。在它那里,穷人的利益,共同体的福祉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四、走向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观

尽管建设性后现代发展理念一直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本身也有不完备之处,但其探索是相当宝贵的,其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对于我们超越或突破一直被视作惟一正宗的、天经地义的现代发展模式,深刻领悟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澄清发展问题上的一些理论混乱,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建设性的思想资源”^[4]。

1. 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现代西式发展观的迷信,正视现代发展观所带来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都意在挑战现代西式发展观,建构一种认真考量环境并将民生放在首位的科学发展观。然而,遗憾地是,许多人依然深陷现代发展观的迷梦中,他们坚信现代发展模式的神话,把“发展是硬道理”曲解成“GDP增长是硬道理”^[5],进而把GDP增长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视经济增长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坚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经济的增长是“硬道理”。这似乎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某种碰不得的“真理”。

后现代对现代发展观的解构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识现代西式发展观的虚妄与不厚道,从而正视我们在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上所遇到的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重重困难,进而寻求破解之道。严峻的现实是,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不仅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全球环境容量和资源支持,而且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不断增大,更主要的是过大的环境代价“已经危及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继续忽视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追求超越极限的增长,“我们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可能付诸东流,我们将失去以相对少的代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机会。”^[6]2012年6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就警告人们,若任由生态危机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将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在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他谈道:人们谈论“生态危机”已很长时间了,但一般公众对生态危机到底有多么严重并不知情。我们常说有两大危机挑战人类文明:一是核屠杀,二是生态危机。实际上,相比之下,生态危机要比核屠杀更为严重。因为核屠杀只是人们发动了核战争的后果,如果核战争不发生,就不会有核屠杀。“而对生态危机来说,情况就不一

[1]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2][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3]王晓华:《走向第二次启蒙》,〔海口〕《书屋》2012年第1期。

[4]王梦阳:《关于珠海发展模式的后现代思考》,2012-09-04, http://www.zhsw.gov.cn/sww_xcb/zxzx/201209/t20120904_314831.html。

[5][6]康瑞华等:《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第242页。

样了,它不需要任何人特意去做什么事情就能终结我们人类的文明。”^[1]

因此,为避免重蹈现代工业文明的泥潭,为了中国自身的生态安全,也为了我们星球的存亡延续,我们有必要重视后现代对现代发展观的批判并借鉴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重新思考发展的路向^[2]。

2.有助于我们澄清“过瘾论”等理论混乱,拥抱生态文明

在当代中国,在发展问题上有一种心态具有相当的影响,那就是“过瘾论”。按照这种理论,长期受西方列强压榨的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崛起了,凭什么限制我们的发展,让我们搞环保,过绿色生活?在“过瘾论”者眼里,“绿色生活方式的要义是节制人的欲望”。“别人都还在拼命追求满足欲望,为什么我们要率先约束?”他们的结论是:即使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我们起码也得过把瘾”,先发展了再说^[3]。

理论上,“过瘾论”显然是现代线性发展观的牺牲品。似乎历史发展一定是依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轨迹而行的。依照这种线性思维定势,生态文明,绿色生活方式是工业文明以后要考虑的事,我们现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现今的当务之急是发展,是实现现代化,是过上“现代生活”,尽管这样下去“地球确实难以支撑”^[4]。显然,批评者的头脑中显然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不先实现工业文明,那里来的生态文明?这些批评者不仅忘了列宁关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显然也遗忘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说,特别是意识具有超前性的学说。

其次,“过瘾论”在道义上也是不负责任的。这种责任感的缺席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对地球,对他人,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上。用有的学者的话说,为了发展经济,我们30年来所消耗的煤炭总量超过此前的三千年!“如果这些煤炭取自本国,则我们在与自己的儿孙为敌,如果这些资源取自国外,则我们在与世界为敌。”^[5]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先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走重复西方发展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6]。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上。因为以消费主义为取向,以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为核心的现代发展模式 and 现代生活方式在其外在的华丽外衣下,其实是布满了千疮百孔的。这样说丝毫没有否认现代发展模式存在着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便利的一面。而是说它带来的问题远较这些便利多得多,也严重得多。

最后,“过瘾论”的背后实际上是现代虚无主义在作祟。虚无主义是现代发展观的孪生姐妹。当经济成为社会的唯一目的,金钱成为人生的唯一价值的时候,道义,信仰,理想和意义就被放逐了,信仰的缺席和意义感的消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弥漫,“过把瘾就死”,“我死后那怕它洪水滔天”,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直接表征。它不仅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孝”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论上是反社会的,而且哲学上是自己“对生命犯下了叛逆罪”(维特根斯坦语)。而站在第二次启蒙尊重他者的立场提出的后现代发展观通过对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追求,对有机共同体的认同,对道德高地的坚守,对人的幸福的强调,则有助于我们找回生命中久违的意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这些都是生态文明的题内应有之义。

[1]格里芬、鲍宗豪、鲁品越:《以人类文明审视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美国后现代著名思想家大卫·格里芬与鲍宗豪、鲁品越教授的对话》,2012年11月6日《深圳特区报》。

[2]王梦阳:《关于珠海发展模式的后现代思考》,2012-09-04, http://www.zhxc.gov.cn/llzc/201209/t20120904_314831.html。

[3][4]所谓“过瘾论”是我自己对类似论点的概括。有关信息可参见江晓原先生《中国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两难处境》一文的分析(见[北京]《绿叶》杂志2009年第2期)。

[5]何兵:《发展不是硬道理》,2011-8-1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49130>。

[6]潘岳:《用东方智慧寻找文明出路》,载廖晓义主编:《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3. 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道发展之路

为了避免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走过的弯路,通过吸纳人类先进的发展理念所蕴含的合理因素,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突破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西式发展理念,“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在这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观无疑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

从建设性现代主义的视阈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可贵努力。后现代主义对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现代发展观的解构,也为我们“寻求另类世界观”,“另类发展模式”提供了空间^[3]。既然华山并非一条路,既然我们并没有一条现成的“康庄大道”可走,“也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可以照搬”^[4]。那么,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条既超越了西式发展的弊端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如果这条路走通了,那无疑将是中国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例如,建设性后现代的多元发展概念,可以启发我们依据中国国情,该发展的地区发展,该保护的地区保护。有些地区要发展,有些地区不发展则是最好的发展。此外,发展未必一定是单向度的,未必等同于城市化,一种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内涵的新农村化,也是一种发展。早在30多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现行的城市化继续发展下去的将是种“社会灾难”,因此人类应该考虑城市“向农村地区回归的问题”,至少应该考虑向工农业并立方向转化,而非一味奔向城市化^[5]。如果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开的解决落后问题的药方,即把8亿农民都弄到城里来,那中国则需要“再建80个像北京上海那样能容纳1000万人的城市”^[6]。对于已经开始饱受大城市病之痛的中国,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化显然并非一种明智的选择,而在城市化的同时,另辟蹊径,向农村发展,走新农村化之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生活品质,使农民活得有尊严,过的幸福,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发展进路。

再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繁荣地方共同体的强调,既有利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确保中国的生态安全。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地方共同体建设好了,当饮鸩止渴般地“像没有明天一样地印发纸币”的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时候^[7],当生态系统崩溃,巨大的生态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将会避免殃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对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封锁,新中国之所以生存下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能够自力更生,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们之所以看好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被西方牵着鼻子走,中国有自力更生的优秀传统^[8]。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中国人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不是最

[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北京〕《人民日报》2004年3月10日。

[2]习近平:《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贺信》,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5584250.html, 2011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M. Shamsul Haque, *Restructuring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olicie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6.

[4]王梦阳:《关于珠海发展模式的后现代思考》,2012-09-04,http://www.zhxc.gov.cn/llzc/201209/t20120904_314831.html。

[5]Arnold J.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Choose Life: A Di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1.

[6]〔澳〕大卫·弗罗伊登博格:《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北京〕《新华文摘》2009年第10期。

[7]《亚洲不能盲目学习西方》,〔上海〕《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0日。

[8]柯布、刘昉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环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最终定型,中国还有机会调试自己,独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这将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条生态文明之路。以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兴衰而闻名的汤因比当年与池田大作谈话时曾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虽然中国过去工业落后,但也因此得以幸运地避免“极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较之后者的巨大代价,中国在未来的前景要光明的多^[1]。

由于中国文化在基因上与现代西式发展观的不同而与后现代发展观的趋同,以关心穷人和弱势族群为旨归的,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在有力地抵抗着金融寡头的霸权,“谋求民众的共同福利”^[2]。这就为一种新的厚道发展观在中国的生根开花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现实基础。正如柯布指出的那样,“长久以来,我们抨击消费主义的盛行,但没能遏制消费主义的流行。中国很可能结合自己的古代智慧,遏制消费主义的潮流。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智慧受到全世界赞赏。”^[3]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明确向世人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这显然是一种中国式的厚道发展观,在重情厚义的中华大地上,她注定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责任编辑:曾逸文]

Towards a Concept of Moral-stressed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Zhihe

Abstract: With the worldwide domination of modernity,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art of modernity, is the rage, worshipped by moderns, especially modern liberal economists. However, the high-speed GDP growth failed to bring about the prospect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promised by liberal economists; instead, it resulted in a great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pervasion of nihilism. Facing increasing poverty,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people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based on Eurocentrism and immoralism.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based on process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in pursuit of common welfare of human and nature calls for a post-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namely, a concept of moral-stressed development. This personalized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th moral content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ackling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helps us get back our sense of meaning, belonging and welfare that have been lost for long in our life.

Keywords: moral-stressed development;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Arnold J.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Choose Life: A Di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3-54.

[2][3]小约翰·柯布:《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前景更为乐观》,柯进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2日。

[4]习近平:《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贺信》,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5584250.html, 2011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